

现代中国异域小说中的东方形象

沈庆利*

<目次>

- 一、唇齿相依下的抗日救亡：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韩国叙事
- 二、东方异域：灾难深重与原始野蛮的“化外之地”
- 三、东方及西方中的“东方”：浪漫炽情与异国情调的叙事背景
- 四、短短的结语：中国与东方的文化血缘及“中国中心”观

中国当代学者李慎之先生曾对当前学界“东方”与“西方”这两个名词的滥用，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在他看来，“东方文化”至少有“东亚文化(姑且以中国的儒家文化为代表)，南亚文化(姑且以印度的印度教文化为代表)，西亚——中亚——北非文化”(姑且以阿拉伯的伊斯兰文化为代表)。三者大不相同，其差别实不亚于中国与西方的差别。¹⁾这的确是很有道理的。相对于“西方”，“东方”是一个更加广大而不确定的概念。东方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尤其是不同文明区域之间的隔阂由来已久，只不过由于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强势发展及其扩张，东方各国诸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倒显得有些弱化了，但彼此之间的差异却依然存在。因此为了避免过于空洞与泛化，需要对“东方”做一个限定：本文所涉及的“东方形象”，主要是指中国周边的印度、韩国(朝鲜)、缅甸等少数几个“东方异域国家”在现代中国异域小说中的呈现。²⁾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1) 李慎之：《关于文化问题的一些思考》，参见《李慎之文选·续二》，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177页。

2) 本文为作者的博士论文《现代中国异域小说研究》的一章，所谓“异域小说”，是指现代中国作家以异域为表现对象和叙事背景的小说作品。

一、唇齿相依下的抗日救亡：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韩国叙事

近代以来，印度、朝鲜等第三世界国家与民族，都先后遭到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与统治，相同的耻辱经历导致了汉民族与她们之间唇齿相依的信任与亲近。至于日本，则在“东”、“西”方的政治文化格局中变成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日本近代以来，“脱亚入欧”论思潮一度甚嚣尘上，迄今仍自认是“西方国家”。但在尚未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之前，也有日本学者出于摆脱西方列强殖民压迫的考虑，主张联合中国等亚洲国家共同抗拒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1885年，日本学者樽井藤吉撰写了《大东合邦论》一书，并于1893年出版。倡议日、韩两国彻底的对等合邦，成为“大东国”，进而与中国联盟，以对抗俄罗斯南下之势。³⁾——现在看来，樽井藤吉的“合邦”是真，“对等”却是假，但此说竟得到了蔡元培、章炳麟等辛亥革命领导者的同感。1907年，章炳麟等曾联络越南、朝鲜、菲律宾等国的留学生数十人，发起成立“亚洲和亲会”。在他们看来，亚洲国家的团结一致、共同抵御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已刻不容缓。不过，“亚洲和亲会”刚刚成立不久，就被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取缔。事实上，早已对亚洲其他国家野心勃勃的日本当局，怎么可能会与那些落后的“劣等”民族“和亲”呢？已经成功实现了“现代化”转型和军国主义扩张的日本，所追求的目标已不再是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和亲”，而是以武力吞并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亚洲国家。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海战，迫使清王朝与之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切断了朝鲜半岛与中国清王朝之间的隶属关系，并加紧对其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渗透与控制。经此一役，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不仅无力保护自己的“藩属国”，还被迫割让台湾岛给日本，写下了近代中国史上最耻辱的一页。1905年，日本将朝鲜半岛变为自己的“保护国”；1910年3月，又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完全吞并了朝鲜半岛。此后，日本殖民当局又将侵略的黑手伸向了中国的东北，先是吞并了东三省，建立了伪“满洲国”，后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染指整个中国大陆。——当年对“日韩合邦”说持肯定态度并心向往之的中国学者们，想必未能预料到历史发展的车轮会留下如此轨迹吧？不过，正是在共同遭受日本侵

3) 参见周佳荣：《近代日本文化与思想》，香港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9页。

略的历史背景下，现代中国异域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表现朝鲜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作品。较著名的有郭沫若的《牧羊哀话》、蒋光慈的《鸭绿江上》、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露西亚之恋》、《骑士的哀怨》、《荒漠里的人》等。这类“借别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作品，洋溢着高涨的爱国情怀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现代中国文学中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牧羊哀话》是郭沫若最早的小说创作，作者自称他是根据1914年初由京奉铁路赴日，途经朝鲜时的一段感受创作而成的，他要“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里。”⁴⁾小说描写朝鲜李朝时代的贵族子爵闵崇华，原是朝廷的重臣，“只因当时朝里，出了一派奸臣，勾引外人定下了什么合邦条约”，闵子爵坚决反对，他“一连奏了几本，请朝廷除佞安邦”，但“本本都不见批发”。闵崇华眼见家国沦亡的大势已去，只好愤而辞职，携妻女来到金刚山的静安寺隐居。随同他的还有其属下、“闵府中的司事”尹石虎一家。在日月累的交往中，尹石虎的儿子英儿与闵的女儿佩夷深深地相爱了。但是，闵的继室李氏夫人却难耐清贫寂寞的隐居生活，她勾结尹石虎阴谋杀害闵崇华。得知这一阴谋的英儿，为了阻止“父亲犯出这样大不义的罪行”，急忙赶到静安寺，却被父亲误刺而亡。佩夷小姐则因恋人的被害而心灰意冷，隐居在山野之中放牧着故人从前放牧过的羊群，把深沉的怀念寄托在哀婉的牧歌之中。这篇小说的情节颇为曲折传奇，几个人物之间的恩怨关系也颇为复杂，但作家显然并非是刻意讲述一个离奇的故事，而是要通过几个人物的悲剧命运，表现出一种深沉的亡国之痛，赞扬了面对异族侵略而不屈不挠、永不妥协的抗争精神。尤其是作品反复渲染的、佩夷小姐牧羊时在山间的咏唱：“羊儿！羊儿！/你莫悲哀；/有我还在，/虎狼不敢来。/虎豹它纵来，/我们拼了命，/凭它衔去哉！”使得整部小说洋溢着令人荡气回肠的悲愤之气。其实，遭受着异族铁蹄践踏的“断肠地方”、“伤心国土”又何止朝鲜半岛？按照作者在散文《创造十年》中的说法，这篇小说创作于1919年的二、三月间，当时“巴黎正开着分脏的和平会议”，正值“山东问题也闹得甚嚣尘上”的时候，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却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联想到不久爆发的“五四”运动，作家通

过这样一个异域题材所忧国情思是不言而喻的。

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同样表达了朝鲜人民的亡国之痛。小说主人公李孟汉，原是朝鲜贵族后裔。日本侵略者占领朝鲜半岛后，父母因投身到抗敌复国的斗争中而被殖民当局迫害致死。日本人还想杀掉李孟汉以斩草除根，幸得他青梅竹马的恋人金云姑一家的搭救，才得以保全性命并流落到俄国。但时隔不久，云姑本人因参加抗日运动而被捕，并屈死狱中。流落在异国他乡的李孟汉得知这一消息后，家仇与国恨交织在一起，情绪一时难以自控。以至于叙述者“我”、来自中国的维嘉看到他那悲哀的神情，“又想想那地狱中的高丽的人民”，“我就同要战栗的样子。”作家还通过李孟汉之口，表达了不可抑止的亡国的悲痛：

高丽三面滨着海，而同时又位于温带，既不枯燥，又不寒冷，无论山川也罢，树木也罢，蒙受着海风的恩润，都是极美丽而清秀的。……可惜高丽自从被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吞之后，文雅的高丽的国民沉陷于无涯际的痛苦里，不能再享受这美丽的河山，呼吸温暖的海风所荡漾着的空气。……日月无光，山川也因之失色。数千年的主人翁，一旦沦于浩劫，山川有灵，能不为之愤恨么？哎哟，我的悲哀的高丽！

诚然，“悲哀的高丽”之所以激起中国人维嘉的深切共鸣，绝不仅仅是因为一种简单的同情，而是出于对自己民族面临着同样危险的洞察和敏感，出于一种与朝鲜半岛唇齿相依的体悟与认识。创作于这篇小说的1926年，尽管日本侵略者还没有大规模染指中国大陆，但对东北三省的野心勃勃的窥伺，早已是“路人皆知”，更不要说台湾岛已在他们的魔爪之下统治了近半个世纪。蒋光慈尽管未能亲眼看到中国民众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景象，但他以自己的小说作品表现出的特有的敏感和政治预见性，却无法不使我们对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报以特殊的敬意。

除了这两部作品外，最值得注意的要数四十年代无名氏的那些以朝鲜为背景的几部小说了。1940年，无名氏曾以记者身份访问并结交了一些朝鲜革命志士，其中包括韩国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等人。从1941年8月开始，他还跟从韩国光复军第二支队长李范奭将军从事新闻宣传工作。这段特殊的经历使他创作了一系列以

4) 郭沫若：《创造十年》，《沫若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卷第54页。

朝鲜抗日志士的斗争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作品，包括《露西亚之恋》、《骑士的哀怨》、《荒漠里的人》等。据说《北极风情画》就是根据李范奭在俄罗斯的一段艳遇创作而成的。这些作品虽然含有太多的空想成分，但作者所倾力渲染的抗日救亡情绪，同样是极为浓烈真挚的。例如小说《露西亚之恋》展现了一群流亡在德国柏林的朝鲜人痛切的亡国之恨与炽热的救国热情。作品中的主人公“金”原是一名在朝鲜奋勇抗敌的军人，因战事失利被迫流亡国外，他“从苏联托木斯克出发，越过波兰，踏入日尔曼的都丁”，受到当地朝鲜侨民的热烈欢迎，他们在一家啤酒酒店举行了一个酒会。在狂歌和音乐中宣泄着对祖国的怀念和抗日救国的火热激情。金在演讲中慷慨激昂地说道：“三十二年来，我们一直与东京的枷锁肉搏着。为了再把太极旗插到汉城，三十二年来，流不尽的血，流不尽的泪，然而——旗必须再插在汉城！……我们要回去啊！我们要回去啊！我们要再回到那开满杜鹃花的祖国。我们要再回到那到处都是圣洁泉水的祖国。我们要再吻一吻祖先用鲜血与泪灌溉的土地……”这种不可抑止的亡国的悲哀和热烈激昂的反抗情绪，又何尝不是当时的中国人民所深深体验着的？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在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共同的敌人”的特殊历史时期，中韩两国人民表现出了少有的“同仇敌忾”的气概，显示了两个民族心灵深处的接近和彼此的声援。这几部作品所描述的韩国人的形象，往往刚烈与温顺相济，也是比较符合韩国民族的真实性格的；至于大韩民族文化中的“狂欢”精神、韩国历史上对“贵族”阶层的看重，也在这几部作品中隐约地得到展示。这说明中、韩两个民族的文化沟通与了解，是相对深入而广泛的。

二、东方异域：灾难深重与原始野蛮的“化外之地”

历史上，生活在中国中原地区的人们往往将“南洋”诸国视为“瘴气”横行、虎狼出没的凶险与野蛮地区。这固然与那里险恶的生态地理环境有关，但在一定程度也

反映了中原人们的文化偏见与自负；中国现代作家虽然以客观冷峻的笔墨表现了那里人们生活的艰辛与沉重，并对他们的困难与不幸表达了感同身受般的同情与理解，但在另一方面，又在相当程度上传承了中国人心目中那个相对负面的“东方异域形象”。在他们笔下，印度、缅甸等周边国家几乎是一片充满苦难、不幸乃至野蛮落后的国土。那里的普通民众大多挣扎在贫困线的边缘，愚昧而卑下；而即使是上等贵族的家庭，仍然实行着严格的非人道的传统家长专制，年轻人的婚恋自由和人格独立得不到起码的保证；原始的野蛮习俗与现代意义的自由、平等乃至爱情观念存在着尖锐的冲突。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年轻人为了寻求理想和幸福，竟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许地山：《命命鸟》）；那里更是女性们的人间地狱，妇女要忍受着丈夫的虐待与欺压，甚至被随意拐卖而无处告诉。

对此笔者以许地山的短篇小说《商人妇》为例作一番分析。这篇小说的通过女主人公惜官那悲苦凄凉的人生经历，向我们揭示了新加坡等南洋地区及印度诸国的、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黑暗现实：惜官从中国的福建出发，不远万里到达新加坡寻找自己的丈夫，却被丈夫伙同在新加坡后娶的马来妻子，卖给了一名叫阿户耶的印度商人。那商人已经有五个妻子，因为在新加坡发了财，竟可以随心所欲地再“多娶一个姬妾回乡享福”。——如此公然违背现代伦理的犯罪行为，竟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发生，足见当地的社会治安和法律制度是何其松懈了。惜官随着阿户耶来到印度的麻德拉斯，开始了更加凄惨的命运，她的鼻子上被“穿了一个窟窿，带上一只钻石鼻环”。——当地风俗之野蛮落后，由此可见一斑。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们进一步发现：这里的男人不仅可以随意打骂妻子，侮辱她们为“低贱的母畜”，还可以动辄不分青红皂白就将妻子休掉。阿户耶的第三任妻子阿嘎利玛仅仅因为向贫困的邻居施舍了些财物，就被丈夫痛斥一顿后将她休掉，而妻子竟然没有任何申诉的权利。总之，惜官的东南亚、印度之行，简直就是一次艰难困苦、凶险无比的“地狱之旅”。尽管作者的本意绝非是向读者展览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落后、野蛮，他不过是以那凶险困苦的生存环境作为叙事背景，来衬托出女主人公的坚定顽强，以及对宗教理念的皈依。但我们仍然不无疑惑：作家为什么将女主人公惜官的“地狱之旅”安排到新加坡、印度等国家与地区，而不是在西方列强之中呢？惜官那传奇般的凶险与悲苦遭遇，其中多少成分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客观反

映，多少成分是作家的主观想象？而在作家的主观想象因素中，有没有某种既定的成见在起作用？

不仅如此，这里人们的外貌也丑陋无比。《商人妇》中，惜官的丈夫新娶的“马来妇人”虽然衣着华丽，却是十足的丑陋与低俗：“她头上戴的金刚钻和珠子，身上缀的宝石、金、银，衬着那副黑脸孔，越显出丑陋不堪。”印度商人阿户耶长得同样不堪入目：“他那副黝黑的脸，猓毛似的胡子，我一见了就憎厌，巴不得他快离开我。”——根据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观点，异国形象的塑造总是藏匿着形象塑造者的自我形象。当我们考察许地山笔下的东南亚、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异域形象时，就不能不联想到这一“形象塑造者的自我形象”，而女主人公惜官恰恰是这一“自我形象”的主要体现者。在这一人物形象身上，凝结了创作主体的人生理想和审美理想。而作为那个社会格格不入的“他者”，惜官的高贵品格和博大的心胸与周围卑琐、阴暗的社会氛围形成了何其鲜明的对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惜官赖以抵御邪恶与困苦的精神资源，竟然是来自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在痛苦的人生际遇中，她遇到了基督徒以利沙伯那样一个“很可亲的女人”，如同在黑暗中点燃了一丝光亮一样，彻底改变了惜官的人生历程。而她更从《天路历程》和《鲁滨逊漂流记》这两部具有浓郁基督教文化色彩的作品中，得到了“许多安慰和模范”。——我们虽然不能据此简单地断定许地山在这里表现了“以西方文化拯救和改造东方文明”的用意，但他视具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惜官作为为“自我形象”的主要体现者，同时把一个负面的东方异域形象看作完全“异己”的所在，还是给我们以丰富的遐想。

如果说许地山的这一表现还显得较为含蓄，那么艾芙在《南行记》中对滇缅边境那一片“化外之地”的描述，则要直露许多。艾芙笔下的滇缅边境，可以说是盗匪横行、犯罪丛生、毒品泛滥；而官府和殖民当局则肆意欺压平民百姓，同时又任凭那些野蛮的强盗到处烧杀抢劫、杀人越货……如此蛮荒与凶险之地，实在与古老中国的“夷狄”想象不无暗和之处。我们发现在这片“天高皇帝远”的“化外之地”，到处开满了“红艳艳的罂粟花”，甚至不时有人向你推销他们的鸦片：“小伙子，你不会吹几口烟，你会中瘴气的！这里彝方坝子不比我们汉人地方，雨水毒得很！”（《我的旅伴》）——在当地人的眼中，避免中“瘴气”的方法竟然是吸食毒品，实在有些让人匪

夷所思。而要在这里生存下去，要么铤而走险，沦为山野盗贼遵从弱肉强食的法则去欺负比自己更弱小的人；要么只能逆来顺受、任人宰割、得过且过。

与许地山一样，艾芙也刻意描述了滇缅边境地区的人们外貌的丑陋。在短篇小说《山官》中，作者这样描写生活在滇缅边境的克钦人：他们“头上缠着黑布帕子，浅发的头顶，或是头顶挽的髻子，则露在外边。……嘴里嚼着槟榔，嘴唇现得血样地红。”——如此外貌，从审美的角度看，除了奇特之外实在称不上美好或漂亮；另一篇小说《海岛上》，在提到来自麻德拉斯的几个印度人时，作者同样不忘加上一个“又矮又黑”的形容词。唯一例外的或许是那些漂泊在滇缅交界中的傣族少女，她们如同“江中的水仙”、“林间的精灵”，常常像“一群神女似的突然在夜间出现”，但她们的美丽却引起了叙述者的困惑：她们生息的家乡也“全是些烟瘴毒烈、汉人不敢常住的地方，怎么会长出这么佳丽的花呢？”很明显，在叙述者乃至作者看来，这些佳丽是不应该属于如此“烟瘴毒烈”的“化外之地”的。（《南行记·我诅咒你那么一笑》）可悲的是，这些美丽的少女要经常遭受上等男人尤其是洋人们的侮辱，她们只能忍气吞声。

《南行记》的绝大多数篇章都是以第一人称“我”的语气叙述完成的，叙述者乃至作者总是在有意无意地暗示读者：“我”只是偶然“闯入”了那样一个“野蛮”世界，偶然和这帮“野蛮人”相遇，然后“不得已”栖身于此地，但“我”最终是要离开它的，最终要回到“文明世界”来实现“远大抱负”。《南行记》的不少小说作品，都以那位叙述人“我”脱离某一群“野人”和“野人部落”而结尾。《山峡中》的结尾，是在“我”醒来时，“发现同伴们都已不见了，空洞洞的破残神祠里，只我一个人独自留着。”在《私烟贩子》的结尾处，“我”终于要离开克钦山去仰光开始了新的流浪：“不管啥子好事情，我都不想留下了。”因为更远大更美好的憧憬在召唤着“我”；而《寸大哥》中的赶马人寸大哥，已经敏锐地察觉到“我”对赶马人实际上是“瞧不起”的。尽管“我”一再言不由衷地分辩“我咋个会瞧不起你们赶马人”，但他仍然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赶马，我愿意的……我就怕，赶一赶的，赶入了迷！”寸大哥的话可谓一针见血：“你怕赶入了迷，就忘记要做别的大事情了……你们读过书的人，真不好，心太大了！”，“心太大”，无疑意味着更远大的志向抱负。很显然，“我”作为这个

“野蛮世界”的匆匆过客，与当地的文化习俗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是格格不入的，而“我”的背后，则是理性、文明与先进的中原与中国文化。

三、东方及西方中的“东方”：浪漫炽情与异国情调的叙事背景

现代中国作家对东方异域的表现，除了刻意强调与中国类似的被西方国家殖民和侵略的历史命运，以及它们自身的蛮荒与苦难之外，另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对浓郁的异域情调、异国风情的渲染。笔者注意到，在对东方异域进行构造与想象的过程中，现代作家们往往不自觉地显示出一种浪漫情怀与从容自如的审美心境，这与对西方国家的构造显然有很大不同。现代中国作家对西方国家的表现，除了像《海外缤纷录》那样的通俗小说之外，大多缺乏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关照，虽然笔下的西方社会，可能更多地具有一种“原欲”的特征。如徐志摩在其短篇小说《肉艳的巴黎》中对巴黎的“肉艳”作了夸张性的描写；而我们在《留东外史》中，在郁达夫、郭沫若等创造社作家笔下，也时时可见日本社会的灯红酒绿。法国、日本等西方社会的繁华及在两性关系上的开放程度，无疑极大地刺激着来自封闭落后的老中国的现代文人们，然而他们与其说是感受到了异国情调，不如说是总是处于被“骚扰”和震撼之中；因此，他们感受到的只是一种“文化震撼”，与真正意义上的浪漫的异域情调相距甚远。——这并不值得奇怪，过于强烈的弱国子民的屈辱感与焦虑感，早已将那些被直接推到西方“国际舞台前沿”的现代作家心中的那一点点浪漫情愫，消除得干干净净。而身为弱国子民的中国现代文人，他们的心思已更多地被“祖国”、“民族”一类的沉重话题填满得满满的，怎么可能再有闲情逸致追寻浪漫呢？相反，他们“失身”于西方国家的妓女怀抱，一次次在摩登而开放的西方大都市里搜寻着“艳女郎”，或者在一个个“触目惊心”的“西洋景”面前流连忘返，又何尝不是排解内心压力和情感孤独的一种方式呢？

在这里，我们还要涉及到“异国情调”的问题。所谓“异国情调”(exotic atmosphere)，一般指对特定民族而言的。它指的是艺术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他国民族的生活方式中，具有某种奇异性质的审美信息和审美氛围。美学意义上的“异国

情调”总是同浪漫主义纠葛在一起。创造社元老成仿吾认为：“从前的浪漫的 Romantic 文学，在取材与表现上，都以由我们的生活与经验远离为他的妙诀，所以他的取材多是非现实的，而他的表现则极端利用我们的想象。”⁵⁾而把人物放到远离现实的遥远的异国他乡，显然更有利于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更有利于表达一种超凡脱俗的浪漫情愫。而浪漫主义和异国情调的“联姻”，其实早在它的发轫之期就已经形成了。欧洲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Romanticism)一词即来自中世纪各国用拉丁文演变的方言(Roman)所写的“浪漫传奇”(Romance)一词，主要是指中世纪盛行的英雄史诗、骑士文学和爱情抒情诗等。这些浪漫主义作品特别是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大都把“神秘的传说”与对遥远的异国的想象，以及奇特而浪漫的爱情经历融为一体，并且有意识地切断作品和现实生活的直接联系，精心构造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虚幻而美丽的文本世界，显示出文学的“迷醉”性与“彼岸性”特征。西方文学中对异国情调的渲染，总是离不开对遥远的东方社会的渲染。无论是传统的经典文学作品，还是今天风靡全世界的好莱坞影片，“异国情调”总是与“东方”融为一体：在那古老而陌生的东方大地上，既有无穷的宝藏和美丽的东方女性等着西方人去“攫取”，也有着愚昧和落后的东方民众期待着他们来“拯救”，浪漫瑰丽的异国情调、大胆进取的冒险精神与盲目自负的道德优越感融为一体，吸引了一代代的西方人向遥远的“彼岸”——东方进发。而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最富有“彼岸性”的遥远的异国，当然应首推西方国家与民族，但如前所述，中国现代作家面对西方强国是很难怀持一种平和和从容的心态，欣赏其“异国情调”的。或许，只有当他们的目光移向东方或者“中东”，在“落后”与“野蛮”的滇缅边境的崇山峻岭中，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圈里，在神秘莫测的阿拉伯海上，我们的作家才能保持一种从容自若的审美心态，才能够细细地品味大自然的奇崛壮观，真正意义上的异国情调才能从笔端涌出；而这种相对从容与平和的文化心态，也使得他们能有“闲暇”去思索和感受诸如人与自然、人与命运等终极性的富有“世界意义”的主题内涵。借助于那梦幻般的同时又不会给自己带来精神压力的异国(非西方)背景，现代作家们尽

5) 成仿吾：《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转引自罗成琰：《现代中国的浪漫文学思潮》，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情表现着人的理性远不能解释的浪漫炽情，体验着超越一切的(包括个人的荣誉、生命和国家民族一类的社会政治概念)的“永恒之爱”的无穷魅力。

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例子是创造社作家成仿吾，他那些以日本为背景的小说，如《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等大多离不开自己穷愁困苦的留学生活。但一般读者恐怕不会注意到，成仿吾还曾写有一篇以中印度为背景的神话小说《深林的月夜》。作品虽然写得不很成功，但那浪漫欢快的叙事风格，实在是与那些以日本为背景的小说截然相反。笔者感到颇为好奇的是：为什么一贯宣泄着留学日本时期的穷愁困苦的成仿吾，笔锋一转到“落后”的东方古国印度，竟也显示出如此浪漫轻松的语调？笔者还注意到，即使是徐訏的《阿刺伯海的女神》、《吉卜赛的诱惑》、《犹太的彗星》及无名氏的《露西亚之恋》等小说，虽然以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为背景，但作品中的人物，除了叙述者“我”这个中国人之外，也只有犹太人、吉卜赛人、朝鲜人等西方国家里的“少数民族”，或来自东方国家的流亡者们。《阿刺伯海的女神》可以看作是充满异国情调和浪漫传奇色彩的杰作。作者巧妙地把奇妙的神话传说与阿拉伯民族独特的文化风俗，以及阿拉伯海的神秘莫测的自然景色融为一体，从而构成了一个瑰丽神奇的文本世界；《吉卜赛的诱惑》虽然描述了“世界罪恶的渊源，奇的中心”马赛喧嚣与繁华，但作者表现的却是一群西方世界里的少数民族——吉卜赛人的浪漫生活。叙述者跟随着心爱的吉卜赛人一起周游欧洲和美洲，从马赛到中国，从中国到维也纳，又从维也纳抵达美国旅行，于是读者也随着这一帮“浪迹天涯”的人们，充分领略着世界各地的奇特风情与美丽风光。而徐訏在《荒渺的英法海峡》中建构起来的“乌托邦”，虽然虚构在英法海峡的一座岛屿上，与现实中的英、法两国是完全不同的；无名氏在《北极风情画》中，则把主人公安置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拖木斯克城。作为一种典型的“跨国之恋”，他们之间的爱情更多地染上了一层浪漫的异国情韵。或许只有在这些东方人身上，作者才能真正寻找到心灵与情感的共鸣，获得一种相对平和从容的文化心态吧。

在对东方异域情韵的表现方面，许地山、艾芙也是不可忽略的，他们以朴实自然的文笔，不带任何造作地向我们展示着一系列东南亚、滇缅边境的风土风物

和奇幻人情，将曲折的苦难传奇、蛮荒、野蛮的边地生活与浪漫诗意的异域风情融为了一体。但是，这种苦难、野蛮与诗意的融合，以及对东方异域的浪漫想象与审美观照的背后，是否也有一些隐隐的文化中心主义情结在起作用？

四、短短的结语：中国与东方的文化血缘及“中国中心”观

中国属于东方世界的一员，不论在地理还是文化上，汉民族和她周边的印度、日本、朝鲜等民族，都具有天然的文化血肉关联。历史上，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并逐渐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主干成分之一；而中国的儒家文化则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一个以东亚国家为主的“儒家文化圈”。而面临被西方侵略与殖民的共同屈辱命运，现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与民族，又产生了唇齿相依般的亲近与信任。但是，传统意义的“中国中心”观念依然在现代作家这里得到了或隐或现的传承，并影响了他们对印度、缅甸及朝鲜半岛等“东方异域”的表现。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真正“中国中心观”的樊篱，而代之以真正平等基础上的民族国家观和“世界观”，仍然是一个较为沉重而敏感、却又常常被忽视的问题。对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和泱泱大国来说，作一些冷峻的反思，是很有必要的。

< 参考文献 >

- 李慎之，《关于文化问题的一些思考》，《李慎之文选·续二》，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
周佳荣，《近代日本文化与思想》，香港商务印书馆，1985。
郭沫若，《创造十年》，《沫若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成仿吾，《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转引自罗成琰：《现代中国的浪漫文学思潮》，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 Abstract >

China belongs to the the oriental world, and she had close relation with these nations such as Indian, Japan and Korea. Some modern Chinese writers created a series of fictions depicted Korean resisting Japanese aggression, which manifested the deep feeling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In general, more writers in modern China described these countries as dragging and barbarian land ; on the other hand, some writers regarded them as the narrative background of romantic exotic theme, which revealed certain complex of ethnocentrism.

Key words : Fictions of exotic them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magines of the oriental world excluding China

원고접수일	2008. 1. 4
심사일정	2008. 2. 15
1차수정	2008. 2. 26
계재확정	2008. 3. 7
출간	2008. 3. 30